

# 桃園、新竹沿山地區的原漢通婚與收養記憶<sup>\*</sup>

梁廷毓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博士生

## 摘要

清初時期的桃園、新竹沿山地區，仍是泰雅族原住民的獵場與生活範圍。因地理位置靠近泰雅部落的傳統領域，地方上的客家、泰雅家族自清代以來，存在不少族群通婚、收養的經驗和記憶。本文透過相關史料文獻，檢視清代至日治初期的原漢族群互動紀錄，以筆者訪問桃園、新竹沿山地區的客家山村與泰雅部落，採錄到的家族記憶和耆老口述為探討案例，指出原漢勢力交界地帶的族群通婚與收養關係，在過去漢人開墾史的主流話語之下，實則是較受忽視的部分。民間流傳的族群互動記憶，不同於過去普遍檔案文獻裡，極力劃界、區隔與禁止交流的族群政策。在民間耆老的認知與記憶裡，「通婚」行為呈現出雙方各自在山林開發的交易關係中的利益算計；「收養」則呈現泰雅人越過「番界」進入到漢人村莊出草時，將嬰孩抱回部落，使其在成長過程中融入部落社會。兩種情況皆有各自在當代的記憶形塑和社會意涵，凸顯出人群互動的多樣性及複雜樣態。

關鍵字：通婚、收養、原漢互動、客家人、泰雅族

## 壹、前言

今日位於桃園、新竹沿山地區，在清帝國統治臺灣初期，仍是泰雅族各社原住民的獵場與傳統領域，目前居住在此區的居民，多以客家族群為主。因地理位置靠近泰雅部落的傳統活動空間，既是客家「內山開發史」的範圍、漢人和平埔族人設劃「隘墾區」的前線，<sup>1</sup> 部分地區也是晚清時期至日治初期「隘勇線」推進下而形成的村落。既往研究多數指出，隨著不同時期「番界」的誕生，移民不斷增多，越界開墾情事屢見，產生的衝突也更多。<sup>2</sup> 在此意義下，原漢衝突在臺灣特指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武裝衝突，<sup>3</sup> 閩、粵與高山原住民之間因生存競爭長期處於衝突狀態。<sup>4</sup> 一方面，由於所開墾之地是泰雅族的領域，所形成與泰雅族之間的嚴重對立，使原漢衝突不斷發生；<sup>5</sup> 另一方面，墾戶以「隘設墾隨」的方式，不斷擴展墾區庄範圍，造成在拓墾之時，墾民們與高山原住民之間衝突不斷。<sup>6</sup> 設隘的所在，不僅是墾地的指標，也是漢移民與原住民交互影響、衝突、對峙的明顯界限。<sup>7</sup> 在此因果關係下，對「生番」既有生活領域的侵害，所呈現出的正是長期且持續產生衝

\* 筆者要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和建議，使本文能夠以更完整的面貌呈現。此外，文中有關「番」的用詞，以及口述訪談之耆老，因地域與語言習慣之關係，會使用當時對原住民之慣用蔑稱「番仔」，而「番」與「蕃」之用字，為昔日史料與文獻慣用之文字，本文在此並無歧視之意。

1 根據施添福的研究指出，清政府在臺灣西部地區設置土牛溝與原住民地界之措施，將整個北臺灣土地劃分為漢墾區、保留區和隘墾區等三個人文地理區。相關研究可參見施添福，〈清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和區域發展：一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臺灣風物》，40卷4期（1990年12月），頁1-68。

2 施聖文，〈土牛、番界、隘勇線：劃界與劃線〉，《國家與社會》，5期（2008年12月），頁42。

3 戴寶村，〈移民臺灣：臺灣移民歷史的考察〉，收於李明珠主編，《臺灣史十一講》（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6年），頁48。

4 參見黃卓權，〈清代北臺內山開墾與客家優佔區的族群關係〉，收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地理學系主編，《臺灣沿山地帶的區域發展：過去、現在與未來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地理學系，2002年），頁5-25。

5 邱瑞杰，〈清末關西地區散村的安全與防禦〉（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00年），頁2。

6 呂佩如，〈清代竹塹內山地區的拓墾：以合興庄為主軸的探討（1820-1895）〉（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客家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頁1。

7 黃卓權，〈隘防線上的衝突——談桃、竹、苗地區的漢、番互動與糾葛〉，《新竹文獻》，14期（2003年11月），頁80。

突的結果。<sup>8</sup>

這類多數以原漢衝突為基調的歷史論述，確實指出過去原漢人群的互動方式之一；但明顯並非唯一之形式。還可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是：原漢人群界線除了在地表上有實際的工事建設形成的界線外，這道界線是否真的隔絕了原漢之間的往來，「生番出草」是否讓後人忽略了原漢之間一直存在著的合作關係與彼此的影響，而只注重原漢的衝突。<sup>9</sup> 地方上的客家、泰雅家族自清代以來，除了流傳早期漢人在「防番」與「番害」方面的記憶之外，<sup>10</sup> 亦存在不少族群互動與通婚、嫁娶的記憶。目前在拓墾時期的平埔族（熟番）、漢人之間通婚情形，以及特定平埔族家族和漢人通婚的歷史考察，已經有一些成果；<sup>11</sup> 或是從日治中葉至戰後的原住民鄉鎮進行客家與泰雅關係的研究；<sup>12</sup> 以個別家族中跨族群通婚的歷史，進行相關的文獻紀錄。<sup>13</sup> 但是，在 18 世紀至 20 世紀初，漢人與「生番」的通婚、嫁娶或收養關係，以及北臺灣的客家人與泰雅族人之間的族群互動記憶，卻較受忽視。

另一方面，既往研究原漢關係的另一個主要論調是：漢人、國家如何

8 溫林文，《清代新竹橫山地區隘墾社會的發展》（嘉義：國立嘉義大學史地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頁 98。

9 參見王慧芬，〈清代前期竹塹地區的『漢番界線』〉，收於若林正文、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文化，2000 年），頁 13-32。

10 相關研究可參看梁廷毓，〈龍潭、關西地區「番害」記憶之口述調查〉，《臺灣風物》，70 期 2 卷（2020 年 12 月），頁 157-184。

11 相關研究可參看黃樹仁，〈沒有唐山媽？拓墾時期臺灣原漢通婚之研究〉，《臺灣社會研究季刊》，93 期（2013 年 12 月），頁 1-47。在特定平埔族家族和漢人通婚的歷史考察與研究，可參考廖志軒，《熟番客家化之研究：以竹塹社錢皆只派下為中心》（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15 年）；楊毓雯，〈「平埔客」之歷史探究：以道卡斯竹塹社廖姓為對象〉（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15 年）。

12 相關研究可參看古羅文君，〈山地鄉的平地客家人：以新竹縣尖石鄉前山地區客家住民之經濟活動為核心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7 年）；徐雲嬌，〈桃園市復興區客家與原住民關係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7 年）；黃清蓉，〈原客通婚與族群認同：以復興鄉前山為例〉（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4 年）；劉瑞超，〈經驗對話與族群互動：關西馬武督地區的泰雅與客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4 年）。

13 相關紀錄與文獻可參看彭啟原，《客家風土誌第一集：銅鑼圈的故事〔DVD〕》（臺北：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2000 年）；陳板，〈意外之旅：竹頭角鄰家與銅鑼圈蘇家會親記〉，《島嶼邊緣》，11 期（1994 年 9 月），頁 98-103；潘仕勤、張懿文、藍郁棻，〈原客通婚：以張也西麗家族為例〉，《竹塹文獻雜誌》，63 期（2016 年 12 月），頁 136-157。

利用他們強勢的力量，迫使原住民族失去土地。例如，黃富三與施添福的論述中，原住民往往被漢人或國家壓迫、剝削，最後從平原移居到近山地區。施添福認為「番地」流失最主要的兩個因素，是國家課餉繁重與勞役、供差繁多。在族人無法專心於狩獵以及耕作，他們必須靠杜賣土地維生，杜賣土地又導致他們賴以維生的鹿場面積減少，鹿場減少又使狩獵收穫更少，造成杜賣土地、地權流失的現象。<sup>14</sup> 雖然，黃富三指出原住民可以採取告官、出草等方式反抗，然而這是徒勞無功的，弱勢的族人終究敵不過強勢的漢人，必須要往內山地區移動。<sup>15</sup> 這類國家或漢人侵逼、威逼之說，若從「生番」的角度理解，這些土地開墾與分配的過程，不過都是清帝國與隸屬於其下的漢人墾民單方面進行的一系列未經協調、任意開墾、分配土地的暴力侵佔過程。<sup>16</sup> 而漢人的「內山開發史」即是一部向原住民土地佔墾的歷史。<sup>17</sup>

然而，學者林文凱也指出，儘管清帝國長期以來的政策是隔離劃界禁止互動，但實際上漢人一直持續跨越界線侵墾，並與山區的「生番」發展出各種的互動關係。<sup>18</sup> 且族群之間的邊界並非靜態穩固的，而是隨著歷史發展過程而變化。這種動態變化的過程，正是外界環境刺激與文化基本架構，不斷地碰撞和相互運作的結果。<sup>19</sup> 換言之，原漢人群互動關係往往有其歷史的複雜性與多樣性，除了多數文獻中以開發、設隘為導向的「防番」與「番害」紀錄，以及漢人佔墾、侵墾所造成的衝突、威逼和壓迫關係之外，在生活層

14 施添福，〈清代「番黎不諳耕作」的緣由——以竹塹地區為例〉，收於《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1年），頁117-140。

15 黃富三，〈清代臺灣漢人之耕地取得問題〉，收於黃富三、曹永和主編，《臺灣史論叢第一輯》（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80年），頁211-213。

16 梁廷毓，〈桃園龍潭近山地區耆老的原客族群互動記憶〉，《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14期（2017年11月），頁130。

17 黃卓權，〈臺灣內山開發史中的客家人〉，《歷史月刊》，134期（1999年3月），頁89。

18 林文凱，〈晚清開山撫番事業新探：兼論十九世紀臺灣史的延續與轉型〉，《漢學研究》，32卷2期（2014年6月），頁148。

19 胡家瑜，〈南庄地區開發與賽夏族群邊界問題的再檢視〉，《臺大文史哲學報》，59期（2003年2月），頁206-207。

面也存在其他細微的互動形式，包括雙方的交易、收養和通婚等。<sup>20</sup> 本文即透過相關史料、文獻，檢視清治時期至日治初期的族群通婚、交往與互動紀錄。接著，以筆者在 2018 年至 2022 年之間，訪問桃園、新竹沿山地區的客家山村與泰雅部落，採錄到數十則的家族記憶和耆老口述為探討案例。

為能具體的討論，本文以口述者可以具體指認出世代輩分與通婚關係的案例為主，企圖指出的是，原漢族群雙方的互動關係，趨近一種相互承認彼此的存在與作用力為前提，進行若干方面的利益關係之算計過程：雙方皆身處於一個「摩擦」與「理解」是一體兩面、彼此毗鄰、相接的生存地帶，並且相互形塑對方生存模式的關係整體當中。藉此角度，希望能夠從這些不見經傳的原漢族群互動關係，理解不同客家、泰雅家族的通婚原因與歷史現象；另一方面，也考察原漢族群通婚的記憶，在今日涉及何種記憶型塑的過程與轉變，反思以往漢人為核心的開墾史書寫，過於偏重官方和漢人社會發展的視角。

## 貳、回顧：相關文獻的探討

清代漢人和平埔「熟番」族群通婚的情形，可溯至康熙、雍正與乾隆時期，因臺灣人口急遽增長，又開放大陸單身男性渡臺，造成男女比例懸殊，一方面漢人女性稀少，另一方面單身漢人男性無法負擔高昂聘金，因此與平埔族女性通婚。<sup>21</sup> 在漢人與「熟番」接觸的過程中，因平埔族群逐漸接受漢文化的影響，也間接地導致不少漢人「納番女為妻妾，以至番民老而無妻，各社戶口日就衰微」。<sup>22</sup> 但在漢人與「生番」互動的情況，除了以「番害」、

20 必須強調，本文所聚焦的「通婚」及「收養」，是以北臺灣內山地區的社會經濟型態及原漢族群關係為背景；與當代社會所理解的通婚與收養之情況、原因有所不同，在此說明之。

21 詹素娟，〈族群關係中的女性：以平埔族為例〉，《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42 卷 4 期（1997 年 4 月），頁 3-7。

22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年），頁 170。



「出草」等衝突形式為主的探討，<sup>23</sup> 在交易、通婚和收養方面則相對較少相關的著墨。

首先須界定本文所討論的「通婚」與「收養」之意涵。筆者所指的「通婚」不同於漢人社會和傳統部落的嫁娶情形，係指在過去沿山地區原漢族群關係，相對緊張的歷史情境下因為部落和漢莊之間雙方因為漢人的山產交易、山區樟腦利益；族人對於槍枝、鹽巴與鐵器的生存需求，而衍生出的姻親關係。「收養」又稱為領養或抱養，係指過去高山原住民族前往異族人的聚落「獵首」（headhunting）的過程，傾向不殺害年幼嬰孩，並帶回部落透過教養方式使其融入部落社會。例如，泰雅族人到平地村落出草時，對 7、8 歲以上者是斬首，但幼兒大多搶奪回家撫養；<sup>24</sup> 在賽夏族方面，這類經由獵首而收養來的孩子，在養父母這端會取得與親生子女完全相同的身分，而且當然與原生家族斷絕親屬關係。<sup>25</sup> 另一方面，跨族群通婚的案例，若以本文所討論的北臺灣內山地區為範圍，其實包含漢人與泰雅族、賽夏族各社、道卡斯族竹塹社、凱達格蘭族霄裡社之間的關係。但須注意的是，清代的平埔族「熟番」和漢人之間跨族群通婚或收養的情況，因為國家體制之變遷、接觸時間長短與社會關係的差異，較不同於漢人與「生番」的關係。本文特別聚焦於漢人和「生番」的互動關係，進行相關的探討。

## 一、前人研究回顧

回顧既往的研究，關於北臺灣內山地區的漢人開發史，大多聚焦在移墾社會的經濟和土地制度的討論，以及強調昔日原漢族群關係緊張、頻繁衝突的歷史過程，鮮少探討到在內山地區原漢關係緊張的時期下，仍然存在其他

23 參見黃卓權，〈隘防線上的衝突——談桃、竹、苗地區的漢、番互動與糾葛〉，《新竹文獻》，14 期，頁 65-81；梁廷毓，〈龍潭、關西地區的「番害」記憶之口述調查〉，《臺灣風物》，70 卷 2 期，頁 157-183。

24 參見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泰雅族》（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6 年）。

25 參見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三卷）：賽夏族》（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6 年）。

的互動行為。李科旻即指出，從《淡新檔案》當中〈林基安為隘廢殃民番擾慘殺號乞迅拘律究伸冤事〉這一案件來看，當時在新竹關西一帶擔任墾戶與隘首的連日昌、王龍福，以及送珠裙、豬、牛到隘外給「生番」的漢人，在此原漢人群對峙的緊張氛圍中，最前線的守隘者卻和「生番」互動密切。認為清代隘防地帶的原漢族群關係，特別是隘墾戶、隘丁首等領導人物與泰雅族原住民的互動，應值得深入研究。<sup>26</sup> 該地區包括不少原漢族群通婚和互動的經驗，今日地方耆老也有所記憶。

學者鄭瑩憶曾透過對《岸裡大社文書》的考察，指出當時客家人為了穩固與「生番」的往來，邊區的客家人會藉由通婚「生番」女子，建立與界外原住民的貿易網絡。<sup>27</sup> 認為這些客家人可能部分利用與「生番」通婚等模式，建立與山區「生番」往來的管道，並認為這種情況其實一直持續至 20 世紀，都存在於地方社會。<sup>28</sup> 學者詹素娟亦指出，苗栗南庄一帶的客家人自清代入墾迄今，向來與賽夏族互動密切，是本地族群關係的核心，原客之間不但在日常接觸中相互採借語言，通婚與收養也相當頻繁。<sup>29</sup> 例如，廣東嘉應籍的黃祈英於 1805 年來臺之後，即在苗栗的斗煥坪與賽夏族人進行物品交易，後娶賽夏族頭目樟加禮女兒為妻，並令其家族後代的男性都要娶一名「蕃

26 李科旻，〈清代新竹鳳山溪流域閩客族群空間分布之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第十二屆教學碩士論文，2013 年），頁 38。

27 參見鄭瑩憶，《混雜的山區：清代東勢角「客家」族群互動與番產交易 (1700-1860)》（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成果報告，2014 年），頁 14。例如，居住在橋頭庄的楊大極，仰仗能通番語，常與生番交易鐵器等禁物，甚至購買生番幼女莊葡，以利其在山區交易活動的進行。九房屋的張阿文隨即在漢人李成章作媒下，牽娶屋鑿社的番婦為妻。東勢角的小匠鄧尚乾、望寮的楊大極皆牽娶內山番婦，並夥同九房屋張阿北、張阿丹等人專以藏帶禁物，交結內山私換。參見〈為稟明究逐事〉，《岸裡大社文書》，國立臺灣博物館藏，編號：cca110001-od-al00957\_145\_01-u.txt；〈為乞詳究逐免貽地方事〉，《岸裡大社文書》，國立臺灣博物館藏，編號：cca110001-od-al00951\_057\_01-u.txt；〈為乞除禍源以安匠民事〉，《岸裡大社文書》，國立臺灣博物館藏，編號：cca110001-od-al00955\_242\_01-u.txt。

28 鄭瑩憶，《混雜的山區：清代東勢角「客家」族群互動與番產交易 (1700-1860)》，頁 24。

29 參見詹素娟，《新苗地區客家族群與原住民互動歷史之研究 (1895-1950) 子計畫二十六》（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2010 年），頁 797。目前關於漢人與賽夏族的通婚、收養習俗之討論與記述，已經有不少研究成果，本文將聚焦於漢人與泰雅人之間的族群通婚、收養記憶之探討。



婦」，並取「蕃名」，日常生活上以蕃名相稱而不稱漢名。<sup>30</sup> 日阿拐（1840-1903）原為大陸閩籍人氏，後被賽夏族人收養，<sup>31</sup> 其家族中的養子也具有客家血統，<sup>32</sup> 原漢雙方家族之間存在細微的互動關係。

在收養的情形方面，學者康培德曾調查桃園復興地區竹頭角、奎輝部落等 Kbuta 世系傳下的泰雅家族，並指出當時部分家族所居住的部落，位於淺山低海拔地區，較早接觸漢人，而有頻繁的互動關係，出草時不忍殺害漢人小孩而抱回部落養育，使家族融入漢人血統，雖其容貌具漢人特質，但生長於泰雅族社會，自我認同於泰雅文化，弔詭的是，這類家族在祖源認同上並不避諱，反而強調「祖先具有漢人血統」。<sup>33</sup> 這類強調族源具有漢人血統特性的家族成員，似有一個共同特性，即是從其祖先融入 Kbuta 世系家族的時期來看，皆發生在日本時代之前。<sup>34</sup>

## 二、既往史料回顧

儘管如此，早在雍正 7 年（1729）巡臺御史夏之芳等人在論述「番界」問題時，已經指出許多漢人有「習番語、娶番婦，將鹽、火藥、鐵販賣入山，致使生番武器日益精良，影響地方治安」的隱憂。<sup>35</sup> 清政府為避免通婚引起的衝突，以及原漢接觸可能帶來的治安顧慮，清代法律禁止漢人與少數民族通婚。<sup>36</sup> 例如，乾隆 2 年（1737）時，清政府即頒佈「漢民不得擅取番婦，

30 王學新，《日治時期新竹地區蕃地拓殖過程與原客關係》（臺北：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成果報告，2008 年），頁 1。

31 日婉琦，〈族群接觸與族群認同：以賽夏族 tanohila 氏族日阿拐派下為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 18。

32 王學新，〈日阿拐後代開墾申請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電子報》第 178 期（2019 年 1 月 30 日），網址：<https://www.th.gov.tw/epaper/site/page/178/2527>（2022 年 6 月 26 日點閱）。

33 康培德，《泰雅族 msbtunux 的美麗與哀愁：頭角與奎輝部落 KButa 世系群家族史》（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9 年），頁 127。

34 康培德，《泰雅族 msbtunux 的美麗與哀愁：頭角與奎輝部落 KButa 世系群家族史》，頁 128。

35 參見張嗣昌，《巡臺錄》（香港：人民出版社，2005 年）。

36 洪麗完，《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臺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1700-1900）》（臺北：聯經，2009 年），頁 129。

番婦亦不得牽手漢民。違者，即行離異」。如果越界進入「番境」者，會以越境罪論處。<sup>37</sup>並納入《大清律例》的「嫁娶違律主婚媒人罪」之內。<sup>38</sup>

但仍沒有遏止原漢人群越界及通婚的情形，道光 14 年（1834）時，官員曹振鏞上奏，指稱「近年有不法奸民，學習番語，偷越定界，散髮改裝，謀娶番女，名為番割……有散髮改裝、擅娶番女情事」。<sup>39</sup>同治 13 年（1874）沈葆楨建議清政府開放原漢通婚，認為「臺地民人不得與番民結親，違者離異、治罪，地方官參處；從前已娶者，毋許往來番社，違者治罪。以上三條，皆嚴禁臺民私入番界之舊例也。際此開山伊始、招墾方興，臣等揆度時勢，合無仰懇天恩，將一切舊禁盡與開豁，以廣招徠，俾無瞻顧」。<sup>40</sup>但是在光緒 13 年（1887）吏部重修頒行的《欽定重修六部處分則例》當中，仍規定「臺灣漢民不得擅娶番婦」。<sup>41</sup>

然而，清政府的禁令顯然在當時的沿山地區，沒有被徹底的執行；或是頒佈禁令之後，仍無法有效阻止原漢人群雙方之間的跨界流動現象。例如，同治 11 年（1872）年時苗栗大湖大窩地區的陳啟明家族即娶泰雅族女性雅優·猶玠（Yayud）為妾，並取漢名為潘也欲。<sup>42</sup>雅優·猶玠後續也協助該漢人家族處理許多與「生番」連絡相關的事務。<sup>43</sup>從現存的文獻進行歸類，

37 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臺灣史料集成資料庫》，網址：<http://edba.ncl.edu.tw/mingching3/copyright.aspx>（2021 年 12 月 03 日點閱）。

38 《大清律例》即指出「福建臺灣地方民人，不得與番人結親。違者，離異。民人照違制律杖一百，土官通事減一等，各杖九十。該地方官如有知情故縱，題參，交部議處。其從前已娶生有子嗣者，即安置本地為民，不許往來番社。違者，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參見張榮錚、劉勇強、金懋初點校，《大清律例》（天津：天津古籍，1993 年）。

39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臺灣史料集成資料庫》，網址：<http://edba.ncl.edu.tw/mingching3/copyright.aspx>（2021 年 12 月 03 日點閱）。

40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灣文獻叢刊二九〉，《臺灣史料集成資料庫》，網址：<http://edba.ncl.edu.tw/mingching3/copyright.aspx>（2021 年 12 月 03 日點閱）。

41 參見吏部，《欽定重修六部處分則例》，收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四輯》（臺北：文海，1976 年）。

42 〈明治二十九年八月中事務報告（大湖撫墾署）〉，《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0084002。

43 參見羅文賢，《陳履獻通事及大湖開拓》（苗栗：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2016 年）。

促成清代漢人和「生番」通婚的原因，大致可分為兩種：其一是原住民下山獵首時，將漢人村落的嬰孩帶回部落，讓嬰孩在部落成長，經由此一「收養」過程，讓嬰孩接受泰雅文化與生活方式，待其成年之後和部落女子結婚；其二是漢人和鄰近部落有所接觸、混居（例如，擔任「通事」、「番割」從事交易、入山焗腦）、或因為某些因素而投靠部落之後，在族人同意下與部落女性結親。

另一方面，根據臺灣總督府檔案記載，清代的「石加祿社蕃人之中混有支那種族的血液，該社殺人次數雖出於其他社之上，但似乎有憐憫之心，殺土民時，並不像其他社一樣連嬰兒也一起殺害，多有抱回哺乳養育的情形，因此才出現許多與土民混血的情形」。<sup>44</sup> 實際上，桃園復興地區在日治時期即有客家人入山定居，<sup>45</sup> 新竹關西的馬武督一帶，也在日治時期有眾多客家人進入定居，<sup>46</sup> 尖石一帶則早在光緒 18 年（1892）開始有漢人進入新竹的內灣、麥樹仁社泰雅族人混居。<sup>47</sup> 在通婚的情形方面，據 1895 年的臺灣總督府檔案記載：

在尖石前山一帶，漢人和「生蕃」經常互相殘殺，但儘管如此，一線的交通卻常存不曾斷過，居中斡旋的便是「蕃婆」，當漢人為了交易準備進入蕃地時，首先要差譴「蕃婆」去得到許可。「生蕃」如認為有交易的必要，亦先差譴「蕃婆」知會漢人。當地與「生蕃」交易的漢人於九芎林有二位，於內灣庄亦有二位，內灣庄的二位漢人都娶「蕃婆」為妻。<sup>48</sup>

44 王學新，《日據時期竹苗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與研究》上冊（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3 年），頁 696。

45 例如，黃清蓉透過田野訪查指出，今日桃園復興一帶多數客家人的祖先，大多數是日治初期為了「製腦」或因為日本人招募隘勇（隘丁）而進入山區。參看黃清蓉，〈原客通婚與族群認同：以復興鄉前山為例〉（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4 年）。

46 劉瑞超，〈經驗對話與族群互動：關西馬武督地區的泰雅與客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4 年），頁 59。

47 王學新，《日據時期竹苗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與研究》中冊（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3 年），頁 1466。

48 光永喜一著，黃麗雲譯，〈蕃界視察復命書〉，《臺灣風物》，37 卷 3 期（2003 年 12 月），頁 183。

在日治初期的理蕃文獻中，亦記載不少漢人和泰雅人的關係，例如，「有粵種土匪數十於馬武督社，土匪亦不下數百餘之數，然皆改易蕃裝、娶蕃婦、從蕃俗，飲食起居，無甚異於生蕃」；<sup>49</sup>「鹹菜甕人徐阿滿，著名之匪首也……遂入馬武督社為生蕃之牛馬……密使出為交換諸事，蕃社大得其便，乃以土目之女妻之，優待有加」；<sup>50</sup>

「西熬蕃社收容土匪張阿慙，張氏並娶蕃婦而成家」。<sup>51</sup> 這些記述中的漢人，皆娶原住民女性為妻，並且常住於部落內生活。甚至在苗栗地區的客家人家族中，傳下一張繪製於 1918 年的《原住民女性長輩畫像》，畫作裡與該家族通婚的原住民女性，仍保有泰雅族的紋面習俗（圖 1）。在 1930 至 1932 年間採錄的世系資料中，Shiigao 社（新竹五峰茅園一帶）族人 Yogai Marai 便是嫁給漢人；<sup>52</sup> Spajack 社（新竹五峰十八兒一帶）族人 Bagan Baai、Yawai Baai 則是嫁給上坪（新竹竹東境內）的漢人；<sup>53</sup> Urai 社（桃園



圖 1 林登貴，《原住民女性長輩畫像》（1918 年）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藏，筆者翻攝  
2022 年 3 月 12 日。

49 不著撰人，〈蕃社大王〉，《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6 月 28 日，版 2。

50 不著撰人，〈蕃殺土匪〉，《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7 月 10 日，版 5。

51 王學新，《日據時期竹苗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與研究》上冊，頁 130。事實上，「土匪」是當時日本殖民者視角的用詞，但淺山地帶在進入日本政權統治之前，清代時期便存在這種人群相互通婚的交往關係。泰雅族人也不稱這些進入蕃地、和族人通婚的漢人為「土匪」。

52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著，楊南郡譯，《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二冊（臺北：南天書局，2011 年），頁 73。

53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著，楊南郡譯，《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二冊，頁 70。

復興小烏來一帶)的 Yawai Taimo 嫁給石門(桃園龍潭境內)的漢人;<sup>54</sup> 竹頭角社(桃園復興長興一帶)的 Burach Yurao 亦嫁給漢人。<sup>55</sup> 顯見一些漢人家族可能與當時仍在「番界」外的部落有著密切往來(而非全然互不往來的仇敵關係),透過各種細微接觸和關係的建立,呈現複雜的人群流動之面貌。

前述史料文獻部分,皆指出北臺灣內山地區從清代至日治時期的原漢通婚、收養行為。然而,較偏向現象式紀錄、描述與文字再現,尚未深究族群之間的記憶型塑及互動關係型態。接下來,本文會以田野調查的第一手材料,探究今日地方上的原漢耆老們,如何記憶與表述自身家族歷史中的通婚與收養關係,以及蘊含何種記憶型塑的特質,並且進一步論述當中人群互動的社會文化及其反映出的政經意義。

### 叁、原漢耆老的族群通婚與收養記憶

本節探討的耆老口述,以今日桃園的大溪、龍潭、復興;新竹的關西、尖石、五峰淺山一帶的客家村落與泰雅部落為範圍。包含位於新竹尖石的麥樹仁部落、水田部落;關西的戈尤浪部落、馬武督部落;桃園復興的奎輝部落等(圖2)。大多是清代至日治初期,面對漢人向山區開發的壓力下,位處山地前線和漢人接觸較為頻繁的地區。在昔日原漢族群關係緊張、頻繁衝突的歷史過程當中,仍然存在不少原漢族群收養、通婚、嫁娶等互動經驗,甚至今日不少地方家族耆老也有所記述。

為能具體的討論,筆者以泰雅、漢人耆老的雙方的口述為主,佐以相關文獻進行比較和對照式的探討。並以耆老能夠清楚敘述族群雙方進行通婚、嫁娶的背景、原因或形式,以及收養方式與祖輩身分等口述資訊為主。並將口述者陳述之通婚性質,從社會性(文化)和生物性(血緣)的角度來進行

54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著,楊南郡譯,《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二冊,頁46。

55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著,楊南郡譯,《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二冊,頁37-40。



探討。必須說明的是，原住民出外獵首時被「收養」、在部落受扶養長大的漢人，實則已經原民化，成為部落社會的一份子，雖然清楚自身具有漢人血統，實際上卻與漢人原生家庭斷絕親屬關係。從社會性關係的角度而言，此類婚姻型態除了生物性的血緣交融之外，鮮少牽涉到原漢之間互動產生的社會性意義，和漢人牽娶「番婦」的情況有所不同。然而，本文選擇納入此種案例的原因是，從後代口述者的觀點，「收養」仍被認知為導致該家族發生原漢通婚的重要因素之一；此種記憶的表述方式，亦反映出後代家屬對於過去原漢互動之詮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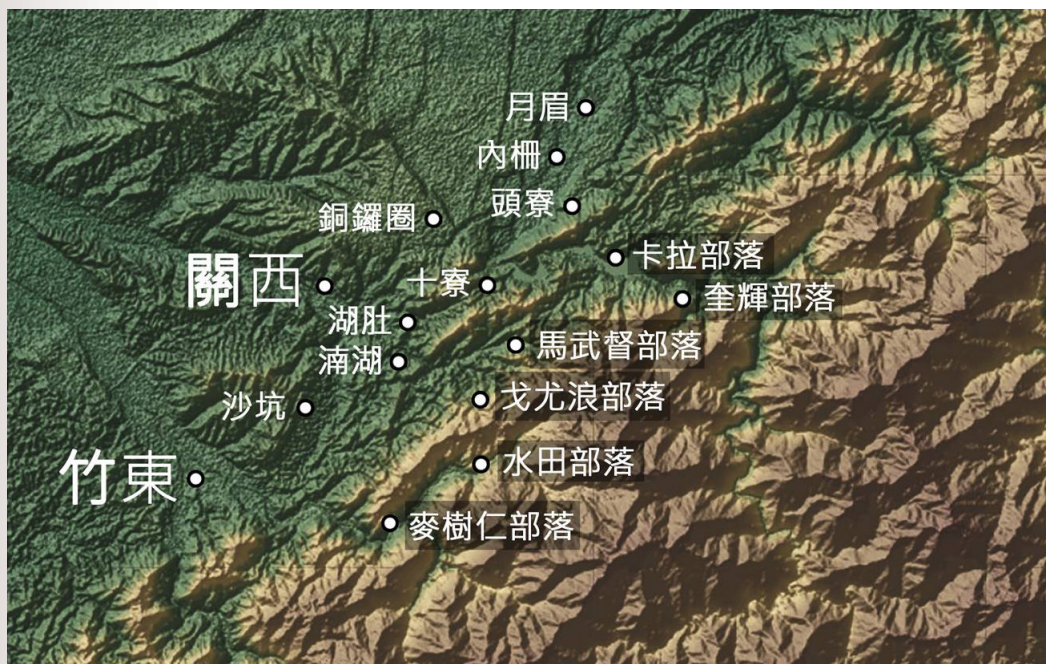


圖 2 本文訪談之部落與聚落概略位置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2022 年 3 月 12 日），底圖為中央研究院，《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資料庫內之〈彩色地形暈渲圖〉，新竹一帶。

### 一、收養相關的口述案例

首先，在昔日原漢族群血緣混融的記憶方面，新竹關西戈尤浪部落的彭姓耆老 A 曾向筆者講述：

我們彭家的一個阿公跟我說，他的祖父還是祖母，有一個是客家人，所以他們的原住民很多都會客家話，我們這些靠近平地的部落，很多家族往上溯，其實都有客家血統，那時候老人家為了要壯大族群的力量，會透過領養漢人小孩，讓他變成泰雅人的方式，成為我們部落的一份子。<sup>56</sup>

彭姓耆老 A 現年 72 歲，出生於戈尤浪部落。表示祖父母輩曾有一位客家人。也提到收養漢人小孩、使其成為泰雅族人，有部分原因是為了要壯大部落的人力。

在收養漢人的記憶方面，新竹關西馬武督部落的黃姓耆老表示，當時族群交往關係並非是「媒妁之言」：

以前會跟客家人通婚的原因，都是老人家把客家人抓去部落領養，是抓去喔，抓去領養之後就跟我們結婚了，就有通婚，不是媒妁之言，沒有正式雙方都同意的結婚，那是被抓來部落的客家人女孩子，就跟我們部落年輕人結婚了。最早最早都在相殺的時候，有通婚的客家女孩子，都是用搶的，我們這裡有這種情形。像有些附近客家人跟我們以前的頭目……跟陳家的有親戚關係的就會說，他以前的阿太就嫁給我們以前的頭目，所以那些客家說他們也有原住民的血統，那邊的客家人講的，現在那些老人家都不在了。<sup>57</sup>

黃姓耆老現年 72 歲，出生於馬武督部落（Mutu，位於關西鎮錦山里）。表示昔時產生族群通婚的原因，並非漢人原生家庭和部落家族父母輩雙方的媒妁之言，並強調是收養（耆老用「抓去領養」一詞）漢人的女孩子，並讓

56 筆者訪談，〈彭先生 A 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20 年 08 月 1 日，訪談地點：彭先生自宅），未刊行。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彭先生 A 代替。

57 筆者訪談，〈黃先生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20 年 06 月 12 日，訪談地點：黃先生自宅），未刊行。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黃先生代替。

其部落青年結婚。相似的例子，是馬武督部落的張姓耆老 B，講述他的曾祖母是客家人，也清楚交代曾祖母被帶回部落的原因：

像我祖母……我祖母不是原住民，她是客家人，客家人就是 Mukan，因為原住民和客家人有相殺後，看到小孩子，我祖母那時候還很小阿，就把她抓回來，大人都砍掉阿，女的帶回來……我祖母就是被帶來的，要去殺漢人的老人家都是這樣，剩下孩子就把她抓回來……聽說，是那時老人家去出草的時候，看到路邊有一個小女孩，已經會走路了，但不會講話，也沒有在哭，看他很乖的樣子，就把他帶回部落。<sup>58</sup>

張姓耆老 B 現年 78 歲，出生於馬武督部落。講述他的曾祖母，是祖先過去在出草過程中帶回部落的女孩子。接著，是桃園復興三光一帶的高姓耆老，口述她的外祖母是客家人：

我的外祖母是客家人，以前小時候住在復興鄉三光那邊，後來嫁到長興、高遠那邊去住，以前我們的男孩子會去出草，說是老人家去宜蘭那邊出草的時候，帶回來的小孩子。<sup>59</sup>

高姓耆老現年 76 歲，講述外祖母是先人去外面出草時，帶回部落的孩子，與前述張姓耆老 B 的家族傳述相似，皆是出草的時候收養回部落，後來融入部落社會的例子。實際上在泰雅族當中，偶爾有人為了族群的強盛，儘管已有子女，卻仍然收養養子，<sup>60</sup> 因此除了帶回女性嬰孩之外，也有抱養漢人男性嬰孩的例子。例如，桃園復興奎輝部落的簡姓耆老曾述，其祖父是從桃園大溪內柵一帶抱養回來的漢人：

58 筆者訪談，〈張姓耆老 B 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19 年 12 月 6 日，訪談地點：張姓耆老自宅），未刊行。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張先生代替。

59 筆者訪談，〈高女士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19 年 4 月 6 日，訪談地點：高女士自宅），未刊行。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高女士代替。

60 趙正貴，〈賽夏族的收養習俗〉，《新竹文獻》，56 期（2013 年 12 月），頁 116。

我的阿公就是原來住在內柵平地人的小孩，出草時不忍殺死，便抱回部落養大，後來日本時代有和外界接觸後，有透過關係和大溪的親族聯繫，國民政府改姓時，改同大溪親戚的「簡」姓。<sup>61</sup>

耆老在訪談中提到祖父是先人去平地獵首時不忍殺死，而抱回部落養大的漢人小孩。這種泰雅族人「收養」異族小孩回部落的原因，也能在奎輝部落的 Watan Pilaw 口述中，看到相似的例子。他的曾祖父是桃園龍潭銅鑼圈一帶的客家人：

曾祖父 Baka Shetz（1871 年生）之父，是以前在龍潭銅鑼圈附近出草時，不忍心殺害客家人而帶回來養大，由 Kawin Nao 收養，命名為 Yukan Kawin，從小就在泰雅部落長大，深受泰雅文化及教育影響，像個十足的泰雅人。<sup>62</sup>

在 Watan Pilaw 耆老的口述中，同樣是因為「不忍心殺害」客家人而帶回來養大」，並成為一名泰雅化的漢人。必須注意，並非泰雅族人透過「收養」過程，有規模和計畫性地來同化漢人。而是族人在向異族聚落執行「獵首」的傳統文化慣習時，偶然在異地發覺到的嬰孩，因此並非計畫性的出外擄掠人力。筆者也訪問到銅鑼圈一帶的蘇姓耆老，家族流傳下一段長輩被「擄走」的口述：

以前泰雅族來出草的時候，把我們家的人擄走，那是我要叫阿太的那一輩，他沒有被殺掉，被帶到復興鄉裡面去，後來他長大後有回來我們這裡認親，我們家還有那時原住民的照片，回來這裡殺豬認親。<sup>63</sup>

61 簡德貴訪談稿，轉引自康培德，《泰雅族 msbtunux 的美麗與哀愁：頭角與奎輝部落 KButa 世系群家族史》，頁 128。

62 Watan Pilaw 訪談稿，轉引自康培德，《泰雅族 msbtunux 的美麗與哀愁：頭角與奎輝部落 KButa 世系群家族史》，頁 127。

63 筆者訪談，〈蘇女士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17 年 4 月 15 日，訪談地點：蘇女士自宅），未刊行。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蘇女士代替。



蘇姓耆老現年 65 歲，出生於桃園龍潭十股寮聚落，此件事情在地方誌中紀錄為「蘇姓姊弟被擄走、撫養之地，為現今復興鄉長興村美腿山區（舊稱竹頭角社）」。<sup>64</sup> 雙方後代相認之事，也有相關紀錄。<sup>65</sup> 在客家耆老的觀點中，以「擄走」來形容泰雅族的收養習慣。此外，筆者在桃園大溪頭寮聚落一帶，也採錄到一則較為特別的口述：

竹篙厝那裡，那殺掉……頭顱都被砍走了，被殺了十三個人，有一個女生，番仔想帶她回去部落，那女生一直哭一直哭，最後頭顱還是給他剁掉，很殘忍……那番仔很恐怖，番仔是從高遠那裡過來的，以前地名叫做高遠，東西也被搶走，人殺掉，東西也搶走，有米、有甚麼都拿走。<sup>66</sup>

口述者廖姓耆老，現年 78 歲，出生於桃園大溪頭寮聚落。她講述原住民出草時，本來要帶回去一位竹篙厝的女孩，但因為死者不肯而不得已將其斬殺。雖然沒有交代該名女性的歲數，是否能構成收養小孩的條件，但仍可以在受訪者的表述中，反映當時泰雅社會具有的收養慣習。

## 二、通婚、嫁娶相關的口述案例

接著，在通婚、嫁娶方面的記憶，是現居馬武督部落的張姓耆老 A，曾講述一位泰雅祖先和客家人通婚的往事：

我的外祖父是新柑坪（今石門水庫一帶）那邊的部落領袖，以前漢人都很怕他，因為他會殺那些進入部落的人。但我爸爸這邊的人，以前第四、第五代以前有一個是客家人，跟我們結婚之後，慢慢一代一代下來就變我們山地人了。<sup>67</sup>

64 潘振鏞，《高原社區拓展史》（桃園：高原社區發展協會，2001 年），頁 104。

65 可參看陳板，〈意外之旅：竹頭角鄰家與銅鑼圈蘇家會親記〉，《島嶼邊緣》，11 期，頁 98-103。

66 筆者訪談，〈廖女士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18 年 5 月 15 日，訪談地點：廖女士自宅），未刊行。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廖女士代替。

67 筆者訪談，〈張先生 A 訪談紀錄〉。



張姓耆老 A，現年 68 歲，出生於桃園復興區新柑坪的卡拉部落（Qara，位於復興區長興里一帶）。他講述祖先曾有和一位客家人結親，並且表示其後代也逐漸融入泰雅社會。接著，戈尤浪部落的羅姓耆老也講述，昔日一位部落領袖的妻子是客家人的事情：

我聽我爸爸講過，我們那個頭目瓦旦·馬瀨（Watan Maray），他是我的外曾祖父……我們和馬武督部落的陳家（瓦旦·馬瀨的後代家族）有親戚關係，我聽我媽媽說，他的老婆是客家人，他有兩個老婆，一個是我們泰雅族的，不會生小孩，後來再娶一個客家人的女孩子，就很會生喔，生了好幾個小孩，所以我們後代都是有客家血統的。<sup>68</sup>

羅姓耆老現年 77 歲，出生於戈尤浪部落（Qyulang，位於關西鎮錦山里、金山里）。根據文獻記載，瓦旦·馬瀨（Watan Maray）是清末時期馬武督社的領袖之一。進入日治時期之後，一直到昭和 3 年（1928）左右，則擔任馬里光群總頭目兼馬武督社頭目。<sup>69</sup> 據後代傳述的說法，娶客家女性的原因，係因為原來泰雅的妻子無法傳宗接代。但也反映出當時部落已經和客家人，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接觸。從徐榮春與劉瑞超撰寫的論文中也可知，馬武督一帶的泰雅人與客家人關係緊密，文中訪談者有不少居民為早期原客通婚的後代。<sup>70</sup> 另一方面，根據奎輝部落的 Batu Haru 耆老所述，家族中曾有因為交易關係而進入部落，進而和族人結婚的漢人祖輩：

68 筆者訪談，〈羅女士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20 年 07 月 12 日，訪談地點：羅女士自宅），未刊行。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羅女士代替。

69 根據記載，移川子之藏等人此次的調查時間落在 1931 年左右，並於 1935 年出版《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根據書中的記述，調查時間點是在瓦旦·馬瀨（Watan Maray）逝世的二、三年後，即是在昭和 3 年（1928）左右去世。參見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著，楊南郡譯，《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頁 65。

70 可參看徐榮春，〈1924 馬武督：泰雅人的土地變遷經驗與 GAGA 對話〉（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人類組碩士論文，2010 年）；劉瑞超，〈經驗對話與族群互動：關西馬武督地區的泰雅與客家〉，頁 81-92。

根據生於民國前三年的祖父 Umay Aziti 口述，曾祖父是在 19 世紀初期，自大溪月眉入山經商，以鹽、鐵器和泰雅人交換山產的李姓閩南人，因和奎輝部落泰雅族的女子 Birey 結識，為了與 Birey 結婚，不顧家人反對遷居奎輝，即未與大溪的親人聯繫，久居之後部落族人給他取了泰雅名為 Shong。<sup>71</sup>

Batu Haru 耆老的訪談中，提到曾祖父是來自桃園大溪的漢人，因為和部落族人從事交易的緣故，進而遷居至部落、部落女性結親的事情。在徐榮春的研究中，也指出在清末時期，泰雅族人認為只要客家人的態度是誠懇的，也有依循傳統的土地 gaga，便能接受新竹關西地區的客家人要求 tmuang（投靠）。<sup>72</sup> 被部落接納之後，便可能經由泰雅傳統的結婚儀式，和族人產生正式的婚姻關係。筆者在桃園大溪的大溪坪一帶，也採錄到一則李姓耆老的口述：

我是姓李的，以前住在大溪三層那裡，後來才進來這裡面開墾，來這裡也有百年了，從我阿太公、我阿公、阿嬤到我老爸……有一個祖先來這裡之後就給番仔招贅，去對岸竹頭角那邊做「番仔駙馬」，「番仔駙馬」……就是他們要出草的時候，會先來講說門要鎖起來，他們來殺的時候門打不開、就會走掉，所以我們家裡的人都沒被殺掉。<sup>73</sup>

李姓耆老現年 83 歲，出生於大溪坪，他講述昔日家族因為來到山區開

71 桃園復興奎輝部落，Batu Haru 口述，轉引自康培德，《泰雅族 msbtunux 的美麗與哀愁：頭角與奎輝部落 KButa 世系群家族史》，頁 128。

72 徐榮春，〈1924 馬武督：泰雅人的土地變遷經驗與 GAGA 對話〉，頁 85。在泰雅社會中，Gaga 的含意包括規範、儀式規則與禁忌、社會契約及習俗等。參見王梅霞，《泰雅族》（臺北：三民，2006 年），頁 119；Tmuang 在此處指的是相較於泰雅族人，較晚來到此地者的投靠。參見徐榮春，〈1924 馬武督：泰雅人的土地變遷經驗與 GAGA 對話〉，頁 251。

73 筆者訪談，〈李先生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17 年 5 月 26 日，訪談地點：李先生自宅），未刊行。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李先生代替。

墾，一位祖先曾「入贅」到竹頭角部落（Snazi，位於復興區長興里一帶）的頭目家裡當「番仔駙馬」。因此原住民要出山獵首時，他的家族都能避免傷亡災禍。與此相似的例子，是新竹尖石麥樹仁部落，筆者訪問到一位徐姓耆老，講述一位祖先是來自新竹橫山一帶的祖先，同樣是「入贅」到部落裡的客家人：

家族有一個叫「阿勇」的長輩，應該是我的曾祖父的上一代人，父親是客家人，母親是泰雅人，算是入贅到我們這裡，因為那時候還是清朝時代，他們進來山裡面弄樟腦，在橫山鄉的沙坑、馬福那邊做事，就和我們有認識，所以他很懂得我們泰雅的 gaga，生活態度很嚴謹。<sup>74</sup>

徐姓耆老現年 80 歲，出生於麥樹仁部落（Mksuzing，位於尖石鄉嘉樂村）。他提到一位曾祖父是客家人，因為入山焗腦的關係，而「入贅」到部落，並且懂得泰雅的 gaga。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過去和部落交好的漢人家族記憶中，也有部落女性前往漢人家中居住的情況，被稱為「牽番婆」或「討番妹」：

我的曾祖父蔡華亮在八寮這裡開發，十寮是徐阿連和陳阿生他們在開發的，因為陳阿生他家以前有「討番妹」，和山地人很好，要出草的時候都會互通消息，所以他們敢到那深山裡面去開發，我們八寮這裡，是因為有和十寮的陳家結親，也會互通風聲，所以也沒有被殺到人。<sup>75</sup>

口述者蔡姓耆老現年 81 歲，出生於新竹關西的八寮。在他的講述裡，昔日「金廣成墾號」當中，負責開發十寮的陳姓家族，曾因為有「討番婆」，

74 筆者訪談，〈徐先生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20 年 9 月 21 日，訪談地點：徐先生自宅），未刊行。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徐先生代替。

75 筆者訪談，〈蔡光隆先生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17 年 8 月 1 日，訪談地點：蔡光隆先生自宅），未刊行。

所以開發過程較為順利。據《蔡氏族譜》記載，十寮的徐阿連家族也有「牽番婆」的紀錄，描述他「變成與生番有親戚關係，他來防守金廣成的四公館比較安全」。<sup>76</sup> 被認為因為有「牽番婆」之故，所以能夠進入到當時較為深山的地方開墾，並且可以避免被獵首殺害。另一方面，筆者也訪問到王姓耆老，講述他從事山產交易的祖父，被山區原住民獵首之後，家中一位「番妹」回到部落，將死者頭顱取回的事情：

聽我阿婆說，以前有一個番妹住我們家，我沒看過她……她是馬武督那裡的人，因為我阿公以前和山上番仔做交易，交換鹿茸、布料之類的東西，後來我阿公牽牛「換番」的時候，被番仔殺掉，那番妹有回去把我阿公的頭拿出來，後來，番妹再回去，也被他們殺掉。<sup>77</sup>

王姓耆老現年 93 歲，出生於關西東山里的湖肚聚落，據筆者的訪查，他的祖父即是《淡新檔案》中被記為「王丙立」的「番割」，<sup>78</sup> 在其被獵首之後，家中的「番妹」，幫忙將死者的屍首取回。然而，這名「番妹」和客家人應該不是依循漢人或泰雅傳統婚俗所認定的配偶關係。泰雅研究者徐榮春曾引述尖石鄉水田部落的 Piling 所述，Piling 的外祖父係來自新竹芎林一帶的客家人，清末時期從事 tobuy（類似挑扶、官方的工友），他總是定期從平地將官方的訊息或命令帶進山地，也順使用扁擔挑一些日常用品（如鍋子、鹽、糖等）賣給部落的 Tayal；當時，Piling 的外曾祖父為了部落與家人

76 蔡景銘，《連森公派下蔡氏族譜》（新竹：未刊行，1974 年），無頁碼。

77 筆者訪談，〈王先生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18 年 7 月 12 日，訪談地點：王先生自宅），未刊行。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王先生稱之。

78 參見〈林基安為隘廢殃民番擾慘殺號乞迅拘律究伸冤事〉：「咸稱胞叔被殺係因連日昌同事番割王丙立殺抵番欠……伏乞大老爺念切民命攸關，迅拘連日昌即番割著匪連阿開、王丙立、（王）龍福到案研訊究償，以伸慘冤」。參見不著撰人，〈林基安為隘廢殃民番擾慘殺號乞迅拘律究伸冤事〉，《淡新檔案》第 17321-2 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此外，筆者亦曾在關西的湖肚聚落附近，訪查到王丙立之墓。

的生活，默許將女兒、也就是 Piling 的外祖母與 touby 結合（非結婚）。<sup>79</sup> 王姓耆老的祖父和該名部落女性的關係，應該較接近此處所謂的「結合」。

「結合」是泰雅族人這端的文化理解，係指並非依照泰雅部落傳統結親儀式、婚約與婚俗規則之嫁娶行為；但對漢人家族而言，娶「番婦」其實有許多不同的情況，這些「番婦」的角色，有的會是「原配」，有的則是「妾」，有的僅是「姘居」（俗稱的「姘頭」）。<sup>80</sup> 就本文所訪問到的案例，地方耆老口述中的「番妹」，應該較接近前述提及的「妾」之身分，即男子除了正妻以外，另行娶來的原住民女子。雖然雙方在社會性（文化）意涵的理解不盡相同，仍具有生物性（血緣）的通婚意涵。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官方文書中，會稱這群在沿山地區和部落互通有無、進行非法走私貿易的漢人為「番割」，這類人物往往也是漢人聚落和部落之間的溝通中介，亦時常因為利益關係而和部落發生糾紛。筆者也採錄到幾則，部落耆老講述族人因為生活物資的需求，將女性嫁給漢人，但反被漢人利用，達到欺壓、削弱族人力量的手段：

原住民頭目為了取得鹽的時候，會把女人嫁給客家人，應該就是在湳湖那一帶，所以有一個嫁過去的，然後我們這離大溪很近，有槍械就是從那邊來，後來頭目有女兒也是嫁給他們，他們來也是羅漢腳，後來關係沒有處很好，也利用她要設計我們原住民，利用那個女的……所以我們被殺死很多人，有一個比較殘忍的，湳湖那幾個臺地都種甘蔗，他跟那原住民講，湳湖那邊有一個山洞，他騙那個原住民，說來我請你吃飯，有幾對夫妻就下去，都配番刀，他們講說我請你吃飯不要帶刀子，後來他卸下刀子，因為比較貪吃，有一比較機警就跑掉，剩下不知道多少對的夫妻

79 徐榮春，〈1924 馬武督：泰雅人的土地變遷經驗與 GAGA 對話〉，頁 12。

80 此處謝謝匿名審查者的提醒。「姘居」係指雙方為非正式配偶，但卻能共同居住和生活。然而，在泰雅族社會這端，究竟如何理解這些不同的社會關係，仍有待進一步考察。



番刀都繳出去了，請吃飯就被抓起來，還沒吃飽就被關到山洞裡面，都沒有給他們水，後來就是嫁過去的那個原住民女子，送飯給它們吃，關了好久，變瘦瘦巴巴的在那邊，好像有偷偷給他一個東西，他們才慢慢磨磨磨（繩子），繩子斷掉才逃走，他說，他們砍那甘蔗一堆堆，就躲到那裡面，晚上又在出來跑回去，瘦到他們只能用稀飯小米粥一點一點餵，不敢一下給他吃東西，所以這邊的原住民都很氣憤。<sup>81</sup>

口述者彭姓耆老 B 現年 65 歲，出生於戈尤浪部落。提到的南湖聚落位於新竹的關西鎮，和戈尤浪部落所在的馬武督溪谷地僅有一溪之隔。他提到族人為了取得鹽巴等物資，會將女人嫁給客家人，但也曾遭遇到陷害與設計。呈現族人昔日為了取得鹽巴而和漢人聚落交好而行使的權宜之計，但漢人卻利用女性族人來取得部落的信任，造成族人遭受欺騙、關押之事，在嫁娶過程當中，明顯存在各自對生存條件的利益算計。新竹五峰白蘭部落的曾姓耆老，也曾講述一則相似的事情：

剛開始客家人來的時候，我們跟他們很好，因為他們人很少，客家人會送東西給我們，交換一些東西，也會有通婚，跟我們借一點土地來種東西生活。就劃定兩邊的界線哪裡到哪邊，都不要越界，但是後來發現他們客家人，晚上的時候，會偷偷移動界線，一直往我們這裡推，每天一點點、一點點這樣移動，我們泰雅的土地就越來越少阿，等我們發現的時候就已經被他們拿去了，我們就很生氣，所以才會對客家人出草。<sup>82</sup>

曾作權耆老出生於白蘭部落（Ruzyan，位於五峰鄉桃山村），他講述新

81 筆者訪談，〈彭先生 B 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21 年 3 月 15 日，訪談地點：彭先生 B 自宅），未刊行。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彭先生 B 稱之。

82 筆者訪談，〈曾作權先生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22 年 1 月 6 日，訪談地點：曾作權先生自宅），未刊行。

竹五峰一帶的泰雅族人，起先跟進入竹東上坪地區的客家人關係還算融洽，剛開始會進行交易與通婚，但隨著客家人侵犯領域的事情被族人察覺之後，雙方逐漸出現土地的爭執。另一方面，也有文獻紀錄泰雅部落當中，若有女孩子不紋面，就要送給漢人，不能在部落結婚：

沒有紋面的女孩會被送給平地漢人，因為那個年代，我們和平地漢人作戰，沒有紋面的人，不論是男的或者是女的，會被錯認是平地漢人，而會有誤殺的時候……父母無能力給女兒紋面，女孩就給漢人。沒有紋面的女孩，送給平安漢人，因為留在部落時，擔心會被族人誤認為是漢人而被獵首……沒有紋面的女孩，父母親會把她送給平地漢人，因為嫁給泰雅人時，娶的男人會擔心有人把她誤認為是漢人而被獵首，因此不會娶沒有紋面的女孩，反正沒有紋面的女孩，沒有任何男人會願意娶她，最後她一定被送給平地漢人。<sup>83</sup>

這類未紋面、送到平地聚落的泰雅女性，也是客家耆老口中的「番妹」或「番婆」，形成原漢人群雙方敵對時期在「番界」內／外的族群流動現象。總體而言，本文所採錄的耆老口述與家族記憶之案例，皆是建立在特定部落和個別漢人聚落、家族之間的交往關係，並非是以「族群」為單位的互動形式。另一方面，可以發現在雙方耆老的口述中，有著各自的歷史認知，以及敘述通婚、嫁娶等族群互動記憶的方式。從泰雅耆老口述部落家族中的客家先人，對照漢人耆老傳述其家族與原住民通婚、收養之記憶，兩者呈現相當不同的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在當代耆老的認知中，無論當時漢人進行「牽番婆」、「討番妹」的原因，或是泰雅人「收養」漢人嬰孩而產生的「通婚」關係，

83 尤巴斯·瓦旦，《苗栗縣泰安鄉泰雅族紋面耆老口述歷史之研究研究報告》（苗栗：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2008年），頁113-117。

都涉及到當時「生番」的獵首、出草習俗，以及違背清政府法令、跨越「番界」內／外的族群流動現象。然而在將原住民女性稱為「番婆」或「番妹」的用語之下，仍有輕蔑的意思，呈現出我族／他族的區辨。但更重要的是，這類記憶也反映出在雙方互動的過程裡，彼此皆是具備某種能動性的歷史行動者之角色。接下來，筆者會進行這類族群互動記憶的反思與探討。

### 肆、通婚、收養記憶的形塑與反思

本文採錄的耆老口述與家族記憶之案例，皆是建立在特定部落和個別漢人聚落、家族之間的交往關係，儘管各自的文化、語言和社會風俗具有差異性，但並非是以「族群」為單位的互動形式。另一方面，可以發現在雙方耆老的口述中，有著各自的歷史認知，以及敘述通婚、嫁娶等族群互動記憶的方式。從泰雅耆老口述部落家族中的客家先人，對照漢人耆老傳述其家族與原住民通婚、收養之記憶，兩者呈現相當不同的情形。以互動及關係性的角度視之，此種民間記憶所反映的是，北臺灣內山地方社會之特性：既位於國家（清帝國及日本帝國殖民初期）的邊區，也處在原漢雙方人群勢力的接觸、邊界地帶，呈現各自面對歷史的視角。

在客家耆老這端的記憶，呈現出漢人與「生番」的通婚、嫁娶與收養關係及原因，情況甚為複雜。除了是漢人和鄰近部落有所接觸、混居、或願意投靠部落，在族人同意下與部落女性結親的案例之外，還有「牽番婆」與「收養」的例子。一方面，在客家耆老這裡，通婚被視為「牽番婆」、「討番妹」，是從事山產交易，或是有開發野心的漢人家族，他們和泰雅族人結為「番親」，通常帶有強烈的功利性與目的性。但是，當時通婚的目的，除了具有為了和「生番」交易與山林開發之意圖，還有一項漢人與「熟番」通婚時較不會有的考量：避免被獵首、殺害。

另一方面，在當代泰雅耆老記憶中，經由「收養」漢人而產生後續的「通婚」關係，與平埔族人因為無後嗣，經特定漢人家族同意之後，收養漢人小孩的原因不同。<sup>84</sup> 往往是昔日泰雅祖先在原漢族群頻繁衝突的時期，到漢人聚落出草、獵首時，偶然遭遇並帶回部落撫養的嬰孩（通常是成年人跑光或被殺害之後，發現餘留下的嬰孩），並以泰雅的文化和祖訓教育，到其成年之後和部落族人通婚。甚至在原漢雙方耆老的認知中，這類族群通婚並不是雙方都知情下的「婚約」，也非「自由愛戀」的結果，反而是「抓來」、「搶來」或「擄走」的嬰孩，被帶到陌生環境成長之後，融入泰雅社會而形成自然通婚的過程。因此，必須注意原漢族群關係的互動多樣性與多層次性，雖然「通婚」與「收養」情形在原漢關係緊張的時期，幾乎是同時發生的現象，但卻各具不同的社會意義。

在傳統泰雅部落社會當中，家庭單位是以父系血緣為中心，構成從夫居住的父系社會。婚姻制度則屬於一夫一妻制的嫁娶婚形式。並於結婚儀式進行當天，雙方家人邀請對方參加婚禮，並準備大量的醃肉、粿、酒等，請眾人共食分享。<sup>85</sup> 但在一些漢人家族「牽番婆」或「討番妹」的案例中，原住民女性的地位，較偏向是傳統漢人家庭中「妾」的角色（例如，苗栗大湖大窩地區的陳啟明）。反觀一些漢人入贅進部落的案例裡，因泰雅文化本來就沒有「妾」的概念，則是部落領袖依循泰雅傳統，同意其女兒與漢人通婚（例如，新竹關西馬武督地區的徐阿滿），反映出雙方不同的婚俗制度和社會認知。雖然案例有限，仍可推測當時原漢族群雙方社會在跨族裔婚姻動機上，應該存在目的差異：即一方是為了取得山區不易獲得的生存物資；另一方大多是為了在開發過程避免「番害」。

84 例如竹塹社的衛阿貴家族，曾因為衛家的第四世孫之後無後嗣，因而將下南片的墾地給漢人杜家，並收養杜家之子。參見張炎憲、李季樺，〈竹塹社勢力衰退之探討—以衛姓和錢姓為例〉，收於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5年），頁173-218。

85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五冊）：泰雅族前篇》，頁184-203。

進一步論，對泰雅耆老來說，一方面是為了和漢人交易鹽巴、器物，而將女子嫁到漢人村落；另一方面，是先人至平地村落出草時，收養漢人嬰孩回部落，在成長過程被「泰雅化」、融入部落生活的 *gaga* 規範、長大之後和部落族人進行的通婚、嫁娶行為。換言之，被收養者往往是於成長過程中在部落泰雅化的漢人，能夠和族人形成正式的婚配關係，因而不同於為了資源需求，目的性地將部落女性和漢人「結合」之情形。但對漢人耆老而言，造成族群通婚的原因，都被認為和當時的「番害」有所關聯，族群通婚的情況，既出現在「番害」發生之後，也限在避免「番害」發生的前提上，似乎將「番婆」、「番妹」引入到漢人與泰雅族的關係當中，與「番害」的認知聯繫在一起。

已經有研究指出，「生番出擾」或「兇番殺人」這類詞彙得以出現在文獻上，反倒是十九世紀沿山各處墾戶、佃戶完成內部整合的具體話語。<sup>86</sup> 隨著「設隘防番」與「隘設墾隨」的內山開發過程，十九世紀北臺灣的隘墾活動，就是這套講「隘」的語言的極致化。<sup>87</sup> 以往「漢人內山開發史」會強調「番界」的劃設，用以區隔「生番」和漢人，一方面防止漢人越界侵墾；也阻絕「生番」出境來獵首。或是在墾區的前線設立隘寮、銃櫃等武力防線，防止「生番」對漢人聚落的危害。在這種歷史論調底下，雙方勢力的接觸往往以衝突或戰爭的形式被記錄；另一方面，歷史文獻大多記載淺山地帶發生的原漢族群衝突、殺傷事件，只有官府覺察到族群互動已經造成治安上的隱憂時，漢人和原住民的交易糾紛、通婚關係，才被提示為一項治理風險的問題。相對的，原漢勢力交界地帶的族群通婚關係，在這一套漢人內山開發史的主流話語之下，實則是被掩蓋與較受忽視的部分。

必須強調，本文並非質疑原漢族群之間總是以敵對、殺戮形式出現的歷

86 陳志豪，《清代北臺灣的移墾與邊區社會（1790-1895）》（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19年），頁147。

87 李文良，《契約與歷史：清代臺灣的墾荒與民番地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2年），頁189。



史敘事，也無意特別凸顯看似較為和平的族群婚姻與收養案例。事實上，敵對、殺戮和婚姻與收養的情形，常常於族群關係普遍緊張的大環境下同時間發生，甚至婚姻關係也曾是特定漢人聚落和個別部落之間，為了緩解敵對、衝突關係的權宜之計。換言之，正是這些互動的歧異性與多樣性，共同交織出原漢族群關係的複雜樣態。尤其部分漢人「通事」或「番割」和部落達成的通婚關係，也表示漢人可能一定程度的能理解部落的社會文化及語言。相對的，族人也會選擇性的接納這類漢人進到部落內居住。王梅霞曾透過文獻指出，漢人或日本人進入山林製腦、伐木、開墾時必須贈送泰雅人牛、豬、銀元來建立「和親盈約」的關係，以符合泰雅部落之間借用土地、或訂立盟約的方式；其次，泰雅人以山產物與漢人或日本人交換外來物資時，也必須先以泰雅人 sbalay（和解）的方式處理過去糾紛。<sup>88</sup> 從一些案例中對個體行為者的紀錄，還是能發覺這種趨近雙方互為主體的互動關係，體現在特定的通婚關係是當時雙方之間彼此共同承認的交往行為。

進而言之，這是一種以相互承認彼此的存在與作用力為前提，並進行若干方面利益關係的算計過程：一方面在雙方通婚之後，和特定族人或山區部落之間訊息互通有無、避免觸發嚴重誤解及激烈的衝突關係之契機；另一方面，也在特定家族及個人層面，避免被部落的「番親」獵首，減緩「番害」在自身家族內發生的機率。甚而在物產交易的過程當中，部落與漢人聚落透過從事「番割」職業的特定漢人家族，達到鐵器與鹽巴、山產與木材的供需關係之平衡。換言之，部落和特定漢人家族的接觸，未必僅對族人的生存有所傷害，也有獲取生活物資層面的益處。雙方之間的交往過程，明顯是基於審慎考量下的互動選擇。

在這些細微的互動關係底下，不同於過去認定漢人不斷跨過「番界」盜伐山區資源，或是侵墾、佔墾與盜墾原住民族山林土地的「漢人侵逼」之說；

88 王梅霞，〈從「交換」看族群互動與文化再創造：日治初期苗栗地區泰雅族的研究〉，《考古人類學刊》，71期（2009年12月），頁133。

也差異於認為漢人為了開發山區資源、從中獲取利益，因而和原住民頻繁發生的「原漢衝突」之關係型態；而是一連串綿密的理性算計和雙方持續協商之結果：雙方皆處在一個關係的整體當中，在實質的接觸及互動層面，雙方在一種「摩擦」與「理解」是一體兩面、生活在彼此鄰近的生存空間當中，相互形塑對方生存模式的互為主體之過程，無法完全將對方視為純粹的「他者」來認識。

換言之，當我們意識到在這種互動關係當中，其實是一種趨近日常生存的綿密時間感時，那麼過往所認知到的衝突關係，便相對是一種間斷性的事件。儘管通婚與收養並非同一件事，但都涉及到族群之間在社會關係與生理意義上文化接觸和血脈交融。但透過「收養」的過程，往往促成日後漢人嬰孩在部落內成長及通婚的結果。另一方面，在漢人和「生番」通婚的紀錄方面，例如「以土目之女妻之」、<sup>89</sup>「娶蕃婆為妻」、<sup>90</sup>「娶蕃婦而成家」等記述，<sup>91</sup>雖然存在於部分的歷史文獻中，但是關於這類原漢族群通婚的紀錄，卻也反映出官方對於沿山地區治安控管的憂慮。而在特定部落家族和漢人家族的記憶當中，則呈顯民間社會主觀的理解。儘管是有限族人的記憶，但仍是具體的家族經驗和記憶，值得吾人加以重視。

具體而言，本文認為民間流傳的族群互動記憶，不同於普遍官方文獻當中，極力批評、禁止與醜化的態度，甚至擔憂地方治安風險之問題。在民間耆老的認知與記憶裡，「通婚」行為呈現出雙方各自的利益計算、生存情感與交易關係；「收養」行為則呈現泰雅人越過「番界」、突破「隘防線」進入到漢人村莊，在「番害」的歷史陰影底下，回返部落存續著漢人的血脈。然而，當我們審視官方關於「隘」與「番害」的相關論述，這些細微的互動記憶都鮮少在於官方的視角之內。藉由民間社會中漢人、泰雅耆老家族流傳

89 不著撰人，〈蕃殺土匪〉，《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7月10日，版5。

90 光永喜一著，黃麗雲譯，〈蕃界視察復命書〉，《臺灣風物》，37卷3期，頁183。

91 王學新，《日據時期竹苗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與研究》上冊，頁130。

的族群互動記憶，或許使我們能夠一窺在原漢族群衝突的歷史底下，那些幽暗細微的人群流動記憶。

## 伍、結語

藉由相關文獻的回顧，本文檢視過往的原漢族群交往、互動紀錄。接著，以過去相關的田野材料，以及在桃園、新竹沿山地區的漢人聚落與泰雅部落，採錄到的家族記憶和耆老口述為對照和探討案例。值得注意的是，在當代耆老的認知中，無論當時漢人「討番妹」、「牽番婆」的原因，或是泰雅族人「收養」漢人嬰孩、撫養長大之後在部落產生的「通婚」關係，都涉及到當時「生番」的獵首習俗，以及違背清帝國的族群劃界禁令、跨越「番界」內／外的族群流動。一方面，至少從訪談者的家族經歷，有助於我們回溯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期，北臺灣內山地區的原漢人群關係；另一方面，這些民間記憶也呈現出原漢關係的多樣性與複雜性。

不同於檔案文獻當中，極力禁止這類沿山地區原漢族群通婚的問題；在民間耆老的記憶裡，「收養」行為呈現泰雅人越過「番界」進入到漢人村莊出草時，將嬰孩回部落，使其在成長過程中融入部落社會；「通婚」行為則呈現出雙方各自的利益計算、生存情感與交易的關係。本文認為，這是以承認彼此的存在與影響力為先決條件，進行各自利益考量的算計：既在雙方通婚之後，和特定家族之間互通有無、交換各自所需的物資和土地；也在特定個人及家族層面，避免被有姻親關係的部落出草，或是防止發生衝突、減緩傷亡的機率。雙方皆處在一個關係的整體當中的視角，既差異於「漢人侵逼」之說；亦差不同於過往「原漢衝突」關係之既定印象，也許能提供一個別於以往漢人內山開發史的歷史圖像，呈現另一種原漢族群互為主體的關係性視角。

另一方面，本文作為初探性的田野調查，未來如何與邵式柏（John Robert Shepherd）和柯志明等人的相關研究論點，進行深入的對話，尚待進一步論述。例如，在清帝國族群治理與政經社會制度的討論方面，柯志明曾指出邵式柏的「理性國家論」之不足，<sup>92</sup>認為雖然國家有理性計算的一面，但國家並不具備超越歷史的特質，國家必須受制於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制度結構，因此國家的行動只是「有限理性」。並強調制度如何限制行動者，而地方行動者如何突破既存的制度，在行動者複雜的互動中，再創造新的制度。<sup>93</sup>若回到沿山地帶漢人與生番之間複雜的通婚、收養關係型態，受制於何種歷史的結構與特定時空環境的影響？是否「番界」的劃設與隘墾制度在其中扮演重要的推動因素？而漢庄與部落人群之間動用的「理性」和歷史「機遇」因素，又如何更細緻的詮釋及描述，皆有待進一步進行對話。

更重要的是，應該要脫離既有以「拓墾」、「設隘」及「防番」為核心的漢人開發史觀點，來進一步理解原漢關係。筆者認為，前人的諸多研究固然重要，但多數研究者皆未考慮到原住民族的主體性。本文藉由原漢雙方在通婚、收養等族群互動記憶的考察：特別是原住民部落相對較少有文字資料傳下，極需要口述記錄來加以輔助；另一方面，在漢人這端的情形是，過去在北臺灣內山從事底層勞作（例如腦丁、隘丁和佃人）的漢人家族，也不見得具有「文字能力」，所能傳下的文字資料亦極其有限，口述歷史也能夠進一步理解這些家族的境遇。因此，本文採取的田野訪談及論述取徑，希冀有助於吾人重建原住民族這一端的理解和認識，亦能更清楚的勾勒出地方漢人家族的族群互動經驗和認知。並且在後續的研究當中，至少能夠跳脫漢人開發史的單一敘事角度，立基在原漢族群雙方互為主體的視角上，來從事相關論題的探討。

92 關於邵式柏（John Robert Shepherd）的國家制度成本損益之政經理性計算論述，參看邵式柏（John R. Shepherd）著，林偉盛、張隆志、林文凱、蔡耀緯譯，《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年），頁 561-563。

93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 年），頁 28-29。

## 參考書目

### 壹、檔案、史料

《岸裡大社文書》（國立臺灣博物館藏）

〈為稟明究逐事〉，編號：cca110001-od-al00957\_145\_01-u.txt。

〈為乞詳究逐免貽地方事〉，編號：cca110001-od-al00951\_057\_01-u.txt。

〈為乞除禍源以安匠民事〉，編號：cca110001-od-al00955\_242\_01-u.txt。

《淡新檔案》（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林基安為隘廢殃民番擾慘殺號乞迅拘律究伸冤事〉，第 17321-2 案。

《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明治二十九年八月中事務報告（大湖撫墾署）〉，典藏號：00000084002。

### 貳、專書或專書論文

王梅霞，《泰雅族》。臺北：三民，2006 年。

王慧芬，〈清代前期竹塹地區的『漢番界線』〉，收入若林正丈等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文化，2000 年，頁 13-32。

王學新，《日據時期竹苗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與研究》上冊。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3 年。

王學新，《日據時期竹苗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與研究》中冊。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3 年。

吏部，《欽定重修六部處分則例》，收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四輯》。臺北：文海，1976 年。



李文良，《契約與歷史：清代臺灣的墾荒與民番地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2 年。

邱瑞杰，《清末關西地區散村的安全與防禦》。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00 年。

邵式柏（John R. Shepherd）著，林偉盛、張隆志、林文凱、蔡耀緯譯，《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年。

施添福，〈清代「番黎不諳耕作」的緣由——以竹塹地區為例〉，收入氏著，《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1 年，頁 117-140。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 年。

洪麗完，《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臺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1700-1900）》。臺北：聯經，2009 年。

康培德，《泰雅族 msbtunux 的美麗與哀愁：頭角與奎輝部落 KButa 世系群家族史》。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9 年。

張炎憲、李季樺，〈竹塹社勢力衰退之探討——以衛姓和錢姓為例〉，《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5 年，頁 173-218。

張嗣昌，《巡臺錄》。香港：人民出版社，2005 年。

張榮錚、劉勇強、金懋初點校，《大清律例》。天津：天津古籍，1993 年。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著，楊南郡譯，《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臺北：南天書局，2011 年。

陳志豪，《清代北臺灣的移墾與邊區社會（1790-1895）》。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19年。

黃卓權，〈清代北臺內山開墾與客家優佔區的族群關係〉，《臺灣沿山地帶的區域發展：過去、現在與未來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地理學系，2002年，頁5-25。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

黃富三，〈清代臺灣漢人之耕地取得問題〉，收入黃富三等編，《臺灣史論叢第一輯》。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80年，頁193-220。

楊毓雯，《「平埔客」之歷史探究：以道卡斯竹塹社廖姓為對象》。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15年。

廖志軒，《熟番客家化之研究：以竹塹社錢皆只派下為中心》。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15年。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泰雅族》。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6年。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三卷）：賽夏族》。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6年。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五冊）：泰雅族前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1年。

潘振鏞，《高原社區拓展史》。桃園：高原社區發展協會，2001年。

戴寶村，〈移民臺灣：臺灣移民歷史的考察〉，收入李明珠主編，《臺灣史十一講》。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6年，頁48-67。

羅文賢，《陳履獻通事及大湖開拓》。苗栗：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2016 年。

### 叁、學位論文

日婉琦，〈族群接觸與族群認同：以賽夏族 tanohila：氏族日阿拐派下為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古羅文君，〈山地鄉的平地客家人：以新竹縣尖石鄉前山地區客家住民之經濟活動為核心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7 年。

呂佩如，〈清代竹塹內山地區的拓墾：以合興庄為主軸的探討（1820-1895）〉，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客家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李科旻，〈清代新竹鳳山溪流域閩客族群空間分布之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第十二屆教學碩士論文，2013 年。

徐雲嬌，〈桃園市復興區客家與原住民關係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7 年。

徐榮春，《1924 馬武督：泰雅人的土地變遷經驗與 GAGA 對話》，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人類組碩士論文，2010 年。

黃清蓉，〈原客通婚與族群認同：以復興鄉前山為例〉，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4 年。

溫林文，〈清代新竹橫山地區隘墾社會的發展〉，嘉義：國立嘉義大學史地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

劉瑞超，〈經驗對話與族群互動：關西馬武督地區的泰雅與客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4 年。

#### 肆、期刊論文

王梅霞，〈從「交換」看族群互動與文化再創造：日治初期苗栗地區泰雅族的研究〉，《考古人類學刊》，71 期（2009 年 12 月），頁 93-144。

光永喜一著，黃麗雲譯，〈蕃界視察復命書〉，《臺灣風物》，37 卷 3 期（2003 年 12 月），頁 33-62。

林文凱，〈晚清開山撫番事業新探：兼論十九世紀臺灣史的延續與轉型〉，《漢學研究》，32 卷 2 期（2014 年 6 月），頁 139-174。

施添福，〈清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和區域發展：一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臺灣風物》，40 卷 4 期（1990 年 12 月），頁 1-68。

施聖文，〈土牛、番界、隘勇線：劃界與劃線〉，《國家與社會》，5 期（2008 年 12 月），頁 37-97。

胡家瑜，〈南庄地區開發與賽夏族群邊界問題的再檢視〉，《臺大文史哲學報》，59 期（2003 年 2 月），頁 177-214。

梁廷毓，〈桃園龍潭近山地區耆老的原客族群互動記憶〉，《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14 期（2017 年 11 月），頁 125-138。

梁廷毓，〈龍潭、關西地區的「番害」記憶之口述調查〉，《臺灣風物》，70 卷 2 期（2020 年 6 月），頁 157-183。

陳板，〈意外之旅：竹頭角鄰家與銅鑼圈蘇家會親記〉，《島嶼邊緣》，11 期（1994 年 9 月），頁 98-103。

黃卓權，〈隘防線上的衝突－談桃、竹、苗地區的漢、番互動與糾葛〉，《新竹文獻》，14 期（2003 年 11 月），頁 65-81。

黃卓權，〈臺灣內山開發史中的客家人〉，《歷史月刊》，134 期（1999 年 3 月），頁 66-71。

黃樹仁，〈沒有唐山媽？拓墾時期臺灣原漢通婚之研究〉，《臺灣社會研究季刊》，93 期（2013 年 12 月），頁 1-47。

詹素娟，〈族群關係中的女性：以平埔族為例〉，《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42 卷 4 期（1997 年 4 月），頁 3-7。

趙正貴，〈賽夏族的收養習俗〉，《新竹文獻》，56 期（2013 年 12 月），頁 104-116。

潘仕勤、張懿文、藍郁棻，〈原客通婚：以張也西麗家族為例〉，《竹塹文獻雜誌》，63 期（2016 年 12 月），頁 136-157。

#### 伍、報紙

《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6 年至 1908 年。

#### 陸、未正式出版報告

尤巴斯·瓦旦，《苗栗縣泰安鄉泰雅族紋面耆老口述歷史之研究研究報告》。苗栗：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2008 年。

王學新，《日治時期新竹地區蕃地拓殖過程與原客關係》。臺北：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成果報告，2008 年。

詹素娟，《新苗地區客家族群與原住民互動歷史之研究（1895-1950）子計畫二十六》。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2010 年。

鄭螢憶，《混雜的山區：清代東勢角「客家」族群互動與番產交易（1700-1860）》。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成果報告，2014 年。



## 柒、影視資料

彭啟原，《客家風土誌第一集：銅鑼圈的故事》〔DVD〕。臺北：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2000年。

## 捌、網路資料

中央研究院，《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網址：<https://gissrv4.siica.edu.tw/gis/twhgis/>（2023/5/1 點閱）

王學新，〈日阿拐後代開墾申請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電子報》第178期，網址：<https://www.th.gov.tw/epaper/site/page/178/2527>（2022/6/26 點閱）。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臺灣史料集成資料庫》，網址：<http://edba.ncl.edu.tw/mingching3/copyright.aspx>（2021/12/3 點閱）。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灣文獻叢刊二九〉，《臺灣史料集成資料庫》，網址：<http://edba.ncl.edu.tw/mingching3/copyright.aspx>（2021/12/3 點閱）。

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臺灣史料集成資料庫》，網址：<http://edba.ncl.edu.tw/mingching3/copyright.aspx>（2021/12/3 日點閱）。

## 玖、其他

筆者訪談，〈彭先生 A 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20年08月1日，訪談地點：彭先生自宅），未刊行。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彭先生 A 代替。

筆者訪談，〈羅女士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20年07月12日，訪談地點：羅女士自宅），未刊行。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羅女士代替。

筆者訪談，〈張先生 A 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19 年 10 月 23 日，訪談地點：張先生自宅），未刊行。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張先生 A 代替。

筆者訪談，〈黃先生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20 年 06 月 12 日，訪談地點：黃先生自宅），未刊行。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黃先生代替。

筆者訪談，〈張姓耆老 B 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19 年 12 月 6 日，訪談地點：張姓耆老自宅），未刊行。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張先生代替。

筆者訪談，〈高女士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19 年 4 月 6 日，訪談地點：高女士自宅），未刊行。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高女士代替。

筆者訪談，〈蘇女士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17 年 4 月 15 日，訪談地點：蘇女士自宅），未刊行。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蘇女士代替。

筆者訪談，〈廖女士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18 年 5 月 15 日，訪談地點：廖女士自宅），未刊行。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廖女士代替。

筆者訪談，〈李先生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17 年 5 月 26 日，訪談地點：李先生自宅），未刊行。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李先生代替。

筆者訪談，〈徐先生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20 年 9 月 21 日，訪談地點：徐先生自宅），未刊行。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徐先生代替。

筆者訪談，〈蔡光隆先生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17 年 8 月 1 日，訪談地點：蔡光隆先生自宅），未刊行。

筆者訪談，〈王先生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18 年 7 月 12 日，訪談地點：王先生自宅），未刊行。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王先生稱之。

筆者訪談，〈彭先生 B 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21 年 3 月 15 日，訪談地點：彭先生 B 自宅），未刊行。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彭先生 B 稱之。

筆者訪談，〈曾作權先生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22 年 1 月 6 日，訪談地點：曾作權先生自宅），未刊行。

蔡景銘，《運森公派下蔡氏族譜》。1974 年，未刊行。

## **Intermarriage and Adoption Memories of the Aborigines and the Han Chinese in the Shallow Mountain Area of Taoyuan and Hsinchu**

Liang Ting-yu \*

### **Abstrac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shallow mountainous areas of Taoyuan and Hsinchu were still the hunting grounds and territories of the aboriginal Atayal Tribe.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was near the traditional territory of the Atayal people, thus there were many experiences and memories of marriage between the Hakka and Atayal families there since the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cords of the interaction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and the Han Chinese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through relevant historical records, field materials, as well as oral accounts of elders documented in the author's visits to the Hakka and the Atayal villages in Taoyuan and Hsinchu. I argue that the marriage and adopti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border areas are actually neglected under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of Han Chinese reclamation history. To the local people on both sides, the memories of community interaction, which have been passed down in the folk societie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connotations of ethnic policy, such as strong demarcation, separation and prohibition, manifesting in general

---

\* PhD Student, School of Fine Arts,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archival literatures in of the past. To the elderly of the local communities the "intermarriage" demonstrates the interest calculation of the both sides in the trading relations of mountain and forest development , whereas "adoption" represents the mutual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process of the Atayal people's crossing the borderline, going headhunting, and taking the Han infants back. Both situations, meaningful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memory, highlight th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human interactions.

Keywords : Intermarriage, Adoption, Aboriginal-Chinese Relations, Hakka, Atayal